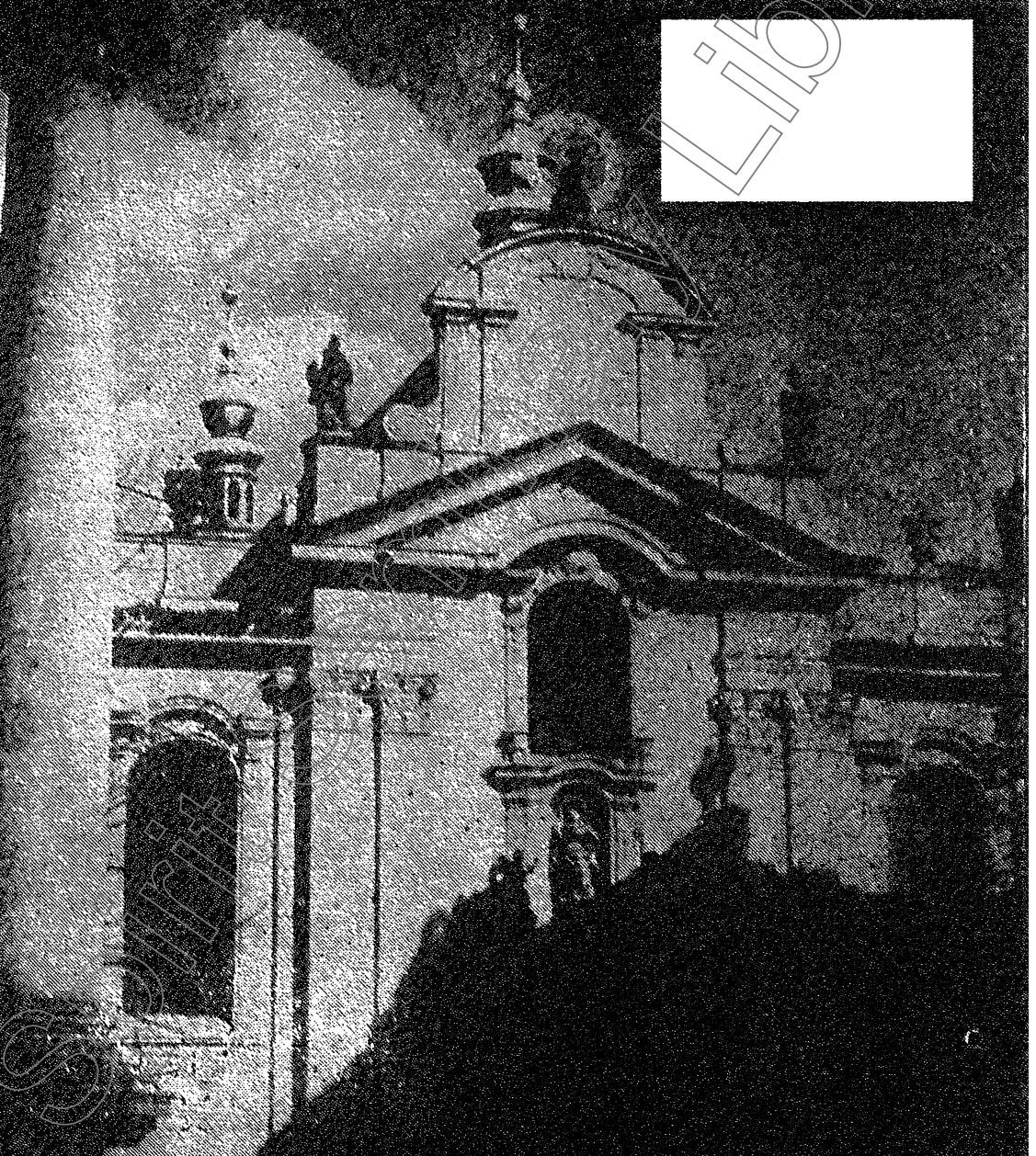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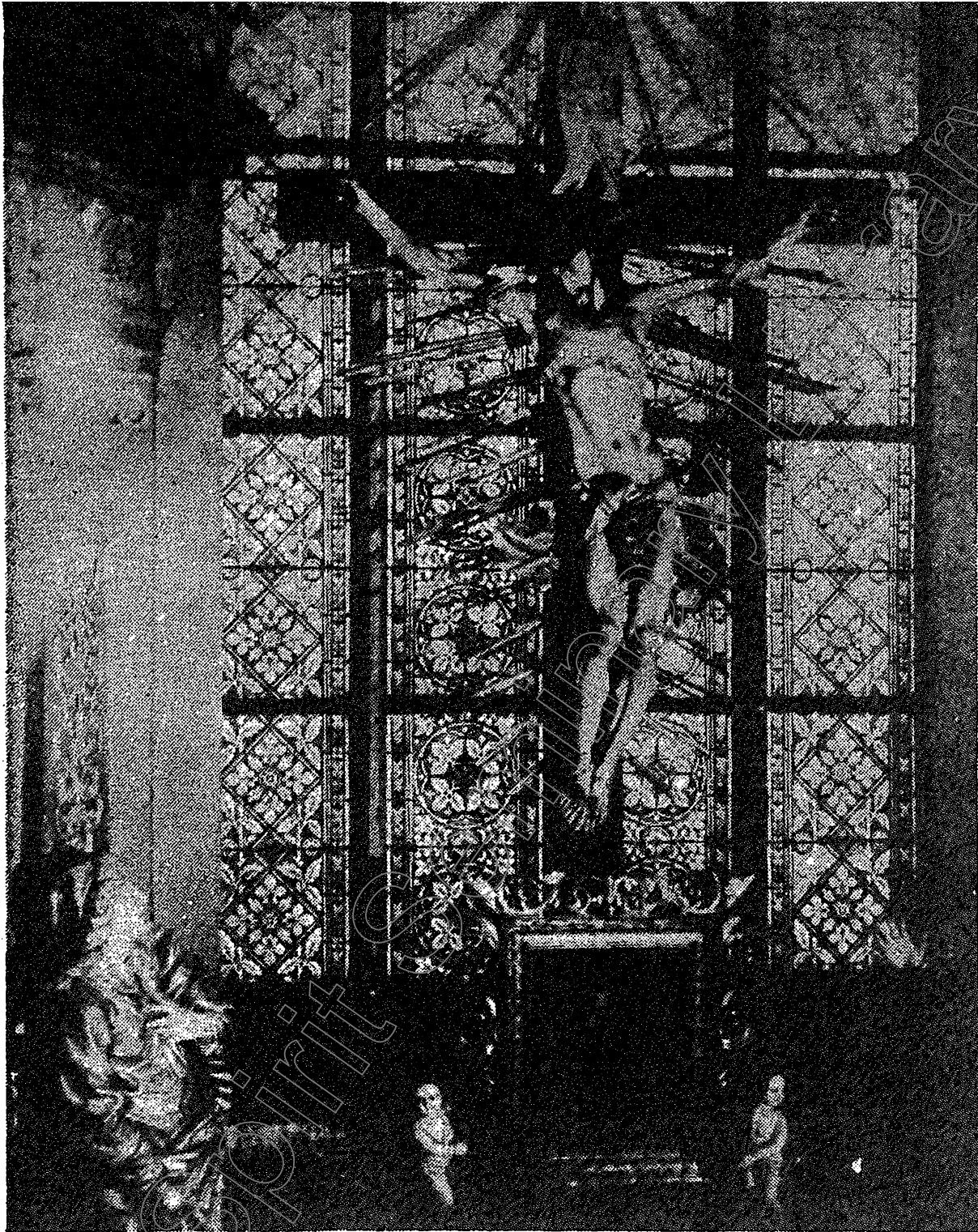
GUANG YANG



HOLY S

7

1958



在今年2月17日至28日，天津市舉辦了一次“捷克攝影藝術展覽”。這裏，我們選刊了這次展覽會上的兩幅照片。

上圖：17世紀木刻的耶穌受難像

(卡列爾·伊欽斯基攝)

封面：一座鄉村教堂

(卡列爾·羅席克攝)

1958年第7期(總第160期)目錄

半月談：再談自選主教的問題	(2)
从“保教权”談到自選主教問題	袁意可(6)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天津市舉行全國會議傳達會議	(17)
廣州教區選出陳亦新任主教	(21)
太原教區選出李德華任主教	(23)
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勝利閉幕	(24)
青海省代表會議勝利閉幕	(27)
各地傳達簡訊	(28)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天津市傳達會議的決議	(29)
天津教區神長教友愛國公約	(32)
在大躍進浪潮中的各地神長教友	(34)
站在農業生產大躍進前列的王慶嘗修女	(36)
大躍進！（詩）	郭樹民(37)
我向人民請罪	趙振亞(39)
耶穌傳	李德培(46)

廣 報

(半月刊)

1958年第7期(總第160期)

1958年4月1日出版

定價：每冊1角

訂閱價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個月 6期 0.60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個月 12期 1.20元
	(天津市新华區西寧道9號)	1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挂号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寄送登記許可證第40號	

再談自選主教的問題

自选主教，这首先是个政治問題，当然也是关系到圣教会切身利益的問題。因此，我們考察这个問題，也就必須首先有个正确的政治立場，这样才不致迷失方向。

历史上一貫維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罗馬教廷，对待选任主教的問題，从来是与政治問題联系在一起的。教廷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以后，为了达到控制教会作为帝国主义进行侵略的工具的目的，首先是控制着教会的人事权，把忠实地执行帝国主义政治路綫的人放在主教的位子上，以便于推行其压迫、奴役劳动人民的侵略政策。

我們可以先从历史上考察这个問題。例如在封建社会里，教廷任命欧洲各国主教，是必須接受封建帝王的干預的，有时帝王甚至还直接任命主教。資本主义兴起以后，欧美各国政府又莫不把主教的选任視為国家主权以內的事，絕不許外国人去干涉或参与，教廷为此曾与許多国家訂有协定。很显然，这都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的。至于对待殖民地国家里的主教人选問題，就变成更为明显的政治問題了。教廷对殖民地教会主教的选任，历来是听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驅使的。

在中国的情况就更为明显。天主教傳入中国的三百多年中是一直沒有中国人当主教的，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把天主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必須把人事权紧紧地控制在手中。因此，中国教会的主教人选，就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垂涎覬覦的对象，它

們爭先在主教职位上摆上其本国人；而教廷也就不惜把主教圣职作为卖官鬻爵的招牌，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过去所謂“保教权”，就是这种“交易”的产物。本刊本期轉載的袁意可神父所写的“从‘保教权’談到自选主教問題”，对此問題叙述甚詳。我們願向讀者推荐这一篇好文章。过去中国教会的人事权竟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外籍主教若不經葡國的許可亦不得来中国，就連教廷所委派的主教亦属无效。这种离奇的現象，显然在宗教道理上是找不出任何根据的。

教廷提升中国的神職人員为主教，是近三十年的事情。这是否是由于純宗教的原因呢？肯定不是的，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看出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教廷在1926年第一次任命了6个国籍主教。这个时候，却正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領導下掀起反帝斗争高潮的时候，广大中国人民正日益觉醒，就在教会中也不乏有志之士大声疾呼地反对帝国主义；教廷恰在这种斗争紧要关头任命国籍主教的用意何在，不是很明显的嗎？这純粹是以任命几个国籍主教緩和中国教友的反帝情緒，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国天主教会为帝国主义充当侵略工具。同时，美国天主教势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滲入了中国教会的，在美国天主教进入中国以后，出現了国籍主教，这就使我們有充分根据，把这个問題与著名的美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联系起来。再看看教廷选任的主教的标准 都是些忠于帝国主义、沒有民族气节的敗类，如于斌之流，就更能使我們恍然大悟了。1946年教廷任命田耕莘为紅衣主教，也充分說明了这个問題。当教廷准备提升田耕莘为紅衣主教时，田耕莘便坐着美国軍艦先到美国，再从美国同斯培尔曼一起乘美国轟炸机飞往羅馬謁見教宗，蛛絲馬跡，不难看出其中底細。当时美国出版

的一家杂志上就曾指出，教廷选任田耕莘为红衣主教，是为了挽救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独裁政权……。这就使我們不难理解为什么“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却总是把田耕莘捧为“上宾”，直到去年二人見面时，蒋介石还指示田耕莘“早日策划大陆重光后，对天主教教务的推展”。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的。

問題是摆得如此明显。为了維护我們祖国的独立、尊嚴，在教会的人事問題上，我們是不能任凭罗馬教廷的摆布的。九年以来，被驅逐的帝国主义分子至今仍窃踞主教头銜，一百余教区正权一直任其缺位，这种难以令人容忍的現象，是不能再繼續存在下去了。罗馬教廷妄想以此为手段要挾我們屈服于它的反动政治路線之下，还把反革命分子龔品梅等說成是“最称职”的主教，我們就必須以自选主教的正义行动来回答它，來击敗它的政治阴谋！

自选后就必須自圣，這是我們应有的权利。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自圣的問題上，有的人还存在一些胡塗观念，他們鑽在法典的死犄角里拔不出腦袋来，他們还对教廷抱有幻想，如提出主教选出应报請教廷加委后再祝圣，等等。也有的人顧慮重重，怕“裂教”，怕“絕罰”。这都是錯誤的。誠然，根据法典規定，祝圣主教要教廷批准加委，但是這應該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首先是罗馬教廷自己切实遵守法典的情况下；而在目前，教廷基于反动政治目的，造成中国天主教会的畸形現象，已經嚴重地破坏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利益，它自己就破坏了法典。如果有人还認為教廷可以改变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場，幻想它会照顧中国天主教会的正当利益，那就无異于“与虎謀皮”，就只会扼杀了中国天主教的前途。至

于“裂教”、“絕罰”，更是无稽之談。我們自选、自圣主教是维护教会利益、照顧教友灵魂的正义行动，是符合天主圣意的，这是为中国天主教会办了一件好事，只应受賞，不当受罰。同时，許多地区选出主教后就通知了教廷，这也就說明了我們沒有否認羅馬教宗是圣教会的元首，何来“裂教”之說？我們既然沒有相反天主誠命，当然也就談不到“絕罰”，如果因此而遭受“絕罰”，这就是基于反动政治目的的“絕罰”，絕无服从的道理。

自选主教，这首先是个政治問題。因为羅馬教廷控制人事权为它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綫服务，所以我們就不能受它的約束。可以預料得到，教廷会拿出法典或甚么信德道理之类来压制我們的，但是无论法典或道理，都應該是维护广揚圣教的利益的，絕不應該解釋为可以取消主教、使天主教无法傳下去。何况法典是人为的法律，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它的行效有其局限性，我們不能泥守陈規而阻碍遵守天主的誠命。聖經上說：“民声即天声。”目前自选、自圣主教的声浪，全国到处宣揚，各教区选出主教的喜訊，接二連三地傳来，一次又一次地振奋人心。过去帝国主义对圣教会的把持宰割，曾严重地伤害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教廷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綫所带给圣教会的灾难，也使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要作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中国天主教教友，要靠了我們自己的力量把圣教会办好！这是全国觉悟了的天主教教友的普遍的声音，也是中悅天主的声音。

全国的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們，我們要采取共同行动，都站在自选、自圣主教的斗争前列来，使全国所有教区都出現煥然一新的局面！

從“保教權”談到自選主教問題

南京教區句容本堂神父袁意可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中提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須彻底的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帶給我們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來办”的方針，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天主教开教三百余年来，一直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帝国主义掌握着中国的“保教权”，包办中国的教务，中国人对中国的教会根本没有自办的权利。实际上梵蒂岡教廷对中国的教务，若沒有帝国主义的同意，也是不得过問的。帝国主义把中国教会視作殖民地，所謂“保教”者，就是利用“保教权”，把教会当作它們侵略的工具。“保教权”給我們的国家和教会帶來了极大的災害。“保教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权利？它是怎样緣起的？經過情况又如何？弄清楚这些問題，对帮助我們进一步認識中国天主教今天必須走独立自主地自办教会的道路，完全是必
要的。

一、中國“保教權”的緣起

自哥倫布于1492年为西班牙發現了新大陸，6年之后(1497—1498)葡萄牙的水師提督瓦斯考達加馬發現了經水道繞好望角通往印度之路。当时西、葡兩国便发生了这样的爭論：“以后发现的新地，应归誰来占領？”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就去要求梵蒂岡教廷給以判断。当时的教宗亞历山大第六世为解决兩國的糾紛就出了一个詔書，把世界分成兩部分，并在亞速尔群島之西100例格^①的地方划了一道綫，規定以后在綫西所发现的尚未被奉教的国家所占領的地方概归西班牙占領；在綫东所发现的地方則归葡萄牙占領。从此以后，很多国家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帝国主义的侵略則成为合法化了。他們可以任意灭亡别的國家，可以任意蹂躪異族的人民。在

这些區域內他們既然可以為所欲為，那麼“傳教權”和“保教權”當然更不成問題。他們可以完全包辦教會。

葡、西兩國獲得了這種權利以後，就提出了一個口號：“通商、歸化、占領。”從此兩國便分頭去執行這種特殊的“任務”：西班牙向西發展，首先占領了墨西哥和祕魯；葡萄牙向東發展占領了印度的果阿，繼而占領馬來亞半島上的麻六甲，再一步是于1557年占領了我國^①澳門，并把这个地方作為葡萄牙“歸化”中國的根據地。

印度、南洋群島和中國既然都包括在葡萄牙的“占領”區域內，于是葡國就有了“占領”和“歸化”這些區域的權利，換言之，葡國在教會方面也就開始握有了“保教權”，可以包辦這些國家的教務。這就是“保教權”的由來。

二、“保教權”的內容

所謂“保教權”大致包含這幾種權利：

1. 發給來中國的傳教士護照；
2. 提名陞主教；
3. 若是教會發生了問題，可以代向中國政府交涉；等等。

三、在葡萄牙掌握“保教權”的時代

當葡萄牙掌握中國“保教權”的三百餘年間，凡來中國的外籍傳教士非經葡國的許可不得進入中國，就是已經僥倖進入了中國的外籍傳教士，葡國對他們也要用盡方法來阻撓和留難。在清政府順治年間，湯若望頗得帝寵，當時有許多人相信：中國有完全信仰天主教的可能。因此教宗于1658年8月17日派巴魯主教為華南代牧主教，以廣東為中心點；1660年又派高陶林底為華北代牧主教，以南京為中心點。但因這兩個主教都是法國人，受到葡萄牙政府的阻撓，均未到达中國。巴魯主教^②曾想繞美洲來中國，但也未獲得西班牙政府的許可，只好又折回歐洲。

1696年教宗依納增爵第十二世又與葡國政府議定，澳門、南京和北京三主教座由葡國建立和維持。葡國得此三主教座，以為從此它的“保教權”就可以遍及全中國。同年，教宗又把中國划為十二個主教區并委派了十二個主教管理教務，但終因葡國之爭權而未能實現。

· 在中國與梵蒂岡教廷通使的問

題上，葡國也會加以阻撓。在康熙年間，教宗格來孟第十一世兩次派使來中國，第一次在1704年派鐸羅主教來中國公布禁止祭祖敬孔之禁令；第二次于1720年派滿柴排爾排主教來中國為緩和因上項禁令所造成之緊張氣氛。但兩次通使均未能成功。據史家評論原因有二：

一、因為康熙皇帝願意在中國之傳教士服從他的權力，不願讓教宗的勢力伸入中國；

二、因為葡國對中國教務有專辦權，凡與葡國無利者便不願與梵蒂岡教廷合作。

因此葡國對教宗第一次所派來的使臣鐸羅主教就會加以迫害。1707年，鐸羅主教于南京宣布祭祖敬孔之禁令并令全國教士、教友“一体遵照無違”。康熙皇帝得悉后認為這是違反中國人數千年來的風俗習慣，就下了逐客令，并將鐸羅主教交澳門總督看管。葡國政府正因為鐸羅主教來中國事先未與葡國商量和未得到葡國的同意，為此乃將鐸羅主教監禁起來，鐸羅遂于1710年死于澳門獄中。

當時領洗進教的中國人已完全成了葡萄牙的順民，一切必須葡萄牙化，採取葡國的生活方式，學習

葡國語言，改換成葡國的姓名。特別是做神父的都有一个葡國姓名：如著名的墨井道人（編者按：即吳漁山司鐸）陞神父后，他的葡國姓名就叫作 A.Cunha。據“澳門記略”上有一段記事說：“其唐人約有兩種：一系在澳進教者，一系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感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聚儿女而傳子孫，或借資本而營貿易，或為工匠，或為兵役……”

雍正皇帝會下禁教之令的原因是：他怕人說他“不能繼承先帝之志”，又怕在京西方教士不能諒解其意。為此他召集在京的傳教士巴多明、馮秉正和費隱三人發表訓話，說明他禁教的原因。內中有一段這樣說：“爾等願我中國人盡為教友，此為爾教之所要求，朕亦知之。但誠思一旦如此，則我等為如何之人？豈不成為爾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唯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則百姓唯爾等之命是从。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百艘戰艦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我們相信：這是因为雍正皇帝看見了教民變為外國順民的情況，所以不能不

提高警惕，下令禁教。他发表这訓話后仅百余年，外国的軍艦果然借着“保教”为名而来我国海岸迫使我国訂立許多不平等條約，把我国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言念及此，怎不令人感叹。

四、“保教權”過渡到法國的手裏

葡国掌握中国的“保教权”大約維持了350年之久。1838年，梵蒂岡教廷不顧前教宗亞历山大第六世的規定和葡国的抗議，把中国的“保教权”轉交給了法国，从此法国便成了中国教会的“保护人”，代替了葡萄牙在中国的勢力。

其原因是：当时的法国在奉天主教的国家中是一个大国，实力最强，它的产业革命虽然落后于英国，但在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間也有极大的发展。当时法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國內局势虽未臻巩固，但尚称稳定。葡国是一个小国，到了十九世紀以后国势就大为削弱。它在海外的属地已大都为英、荷諸国所夺取，國內資源缺乏，工业根本沒有发展，而在1808年又曾为拿破崙所征服，它的王室流亡到巴西。在这种形势下葡国自顧不暇，那里

还能再有力量来争夺中国的“保教权”呢？况且这时在中国的外国傳教士中，法国人已占大多数，法国人当然不肯“屈尊就卑”的接受葡国的“保护”。梵蒂岡教廷見到葡國的国勢已經一落千丈，而法国在海外的野心大熾，于是不念旧情，把“保教权”轉送給了法国。

五、在法國掌握“保教權”的時代

法国在中国开始执行“保教权”的日子，也正是中国人民遭受大灾难的开端。当时法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极微，它侵略中国就只好以“保教权”为借口，以教会为侵略的工具。1844年，法国援引“利益均霑”之說，强迫中国訂立黃埔條約，條約中規定法国得在英國所强迫中國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上設置教堂及医院以外，法国全权代表拉格尼要求中国政府取消自雍正以后一百二十年以来的教禁。当时清政府答应法国的要求，下令准中国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1846年又下令发还当初沒收的天主教教产。

1857年，法国政府又借口馬奧斯丁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案件与英國发动第二次鴉片战争。1858

年，英法联軍攻入天津，清政府被迫投降，随后英法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强迫中国签訂了中英和中法天津條約。在中法天津條約第13款中規定：天主教的傳教士，只要有外國領事發給再由中國地方官蓋印的护照，就可到中國內地去傳教，官廳必須極力予以保護，信教的不受任何虐待。法國政府以此為據，強詞奪理，謂條約給了它“保教權”，从此一切天主教傳教士，無論為教廷所派遣，或為侵略我國的各個國家的教会所派遣，都必須持有法國的护照。法國如此把持天主教，也就難怪人家有時稱天主教為“法國教”了。

1860年，法國又強迫清政府續訂北京條約，條約第6款規定：“應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即頒示天下黎民，任各地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拿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公之天主堂、學堂、墳塋、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當時充當翻譯的法國傳教士還在條約中私添了一條“并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

便。”由於清政府昏瞞无知，竟也糊里糊塗的在上面簽了字。

1867年法國洪主教竟私制關防，移行四川省官員；1868年法籍主教胡縛在貴州擅送照會，保舉道員，并脅迫清政府撤換地方官。1899年，北京的法國主教樊國樑還逕自與清政府總理衙門訂立了關於教士待遇的辦法。辦法規定：“天主教主教與督撫平行，總司鐸與司道平行，司鐸與府縣平行。”該辦法還規定：“華官按照司鐸等級，分別答拜。”同時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中還出現了一種以一省最高長官自居的“自称巡撫”的現象。這種在“保教權”庇護之下的“鑄用關防”、“保送道員”、“自称巡撫”的狂妄行為，已經足夠說明外國傳教士完全把中國當了他們的殖民地。依照1860年中法續訂北京條約中“發還教堂”的規定，還發生了無數血淚斑斑的事迹。由於外國傳教士有法國為他們撐腰，因而在江蘇、江西、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省都發生過教士以“還堂”為名義霸占民眾田地和房产的事件。在不平等條約的情況下，外國傳教士無辜屠殺中國人的事件亦常有發生，

如 1869 年在四川的外籍神父覃甫臣一次就屠杀了当地人民赵永林等 200 余人，在最后只是一走了之。此种情况，连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也看不过，他于同治九年（1870 年）上了一道奏折，把情形向同治皇帝奏道：“自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皆相安无事，唯法国以传教一节，屡滋事端。即各教流传，如佛、道、回等教，民间皆安之若素。……唯天主一教，屡滋事端。非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则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虽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疾咎以去。”③

曾国藩的这段描述，说得很透彻清楚，只是他的解释肤浅，仅顾到表面：他认为是教士“但求从教之众多”，而不知其中的故意滥收地痞流氓，故意“屡滋事端”，以便制造侵略我国的借口。如前面所说的广西西林教案，就成了法国联合英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这种为侵略制造借口的教案是不计其数的。仅从 1856 年到 1898 年的四十二年中间，有史可据的重大教案就有四十七件。在这四十七件重大教案中，牵涉天主教的有三十九件，占 83%。在有关天主教的三十九件教案中，牵涉到法国传教士的有三十七件，占 95%。另两件是：一件牵涉西班牙传教士，一件涉及德国传教士，就是山东钜野教案，德国侵略者也曾以此作为借口强迫中国政府割让胶州。

六、德、法争奪“保教权”

帝国主义者看到利用“保教权”可以为自己的殖民主义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在“保教权”问题上，帝国主义者之间就勾心斗角争夺不休。

1879 年圣言会士来中国传教，

1886年教宗將山东划分为南北二教区：南教区交圣言会管轄，委安治泰为代牧主教。来中国的圣言会士大都是德国人。自普法战争后德国成了胜利者，若要德国人受法国的保护，德国人認為是恥辱。为此，法国的“保教权”在山东南部就成了問題。1882年，德国駐巴黎大使就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交涉。

德国本来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它的皇帝是奉基督教的。“鐵血宰相”俾斯麦又是排斥天主教的，并曾制訂“五月律”，將天主教之政治权利剥夺殆尽，凡不服从当时德国政府命令的主教、神父严加处罚。圣言会的会祖楊森因在国内无立足之地就逃往荷蘭，在史塔依尔地方創办了圣言会。在这里人們就要发問：一个在国内迫害天主教的基督教政府，为什么又偏要“保护”在国外的天主教呢？

要知道，德国本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掠夺殖民地方面已大大的落后于英、法兩国，所以就急想赶上英、法。这时适有德国探險家回国后向政府叙述了英、法等国的傳教士在发展殖民地方面所起的作用。俾斯麦遂一反其往常排斥天主教的态度：廢除了“五月律”，

而且制訂了“保护”与“培植”天主教傳教士的“修会新法”，并在德国主教年会上議決：要以史塔依尔圣言会会院为模范，在国内另立六个修道院培养傳教士，以作侵略的先鋒。为了达此目的，必須首先夺取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从此德国傳教士們就处心积虑的在“保教权”問題上对法国进行破坏。

北京北堂第一次建筑是在1703年完成的，原址在中海西畔，地名叫蚕池口。这堂于1827年被銷毀。第二次建筑于1866年，是法国政府为紀念中法天津條約而用公款建成的。該堂长十五丈，寬六丈四尺，有左右二鐘塔，高聳云霄。每日过午，日照塔影倒落于宫廷之中，再則每逢瞻礼主日，教友唱歌唸經之声，喧嚷聞于宫廷，使宫廷中之人不覺忆及1860年的敗績而感莫大之恥辱。慈禧太后为此大为不悅，極欲設法除去此塔，因此乃有迁移北堂之議，但又不敢直接向法帝国主义交涉。当时德国駐京公使普蘭特（天主教徒）采悉此事后，便向李鸿章献策說：“管理此堂的味增爵会士都隶属于羅馬教宗，若欲迁移教堂，可以与羅馬教宗直接交涉，但是中国与羅馬教廷并无外交关

系，必須先請教宗派使節駐在北京，讓他直接來管理教會，事情就好辦了。”清政府正因“保教”之事受盡法國的壓迫，大傷腦筋，遂決意采納德使的建議，並命稅務司德璫琳派英人英士敦若翰攜旨往羅馬交涉通使問題。當時由於英、意、奧等國對法國之壟斷“保教權”都不滿意，所以都願暗中相助，希望能夠成功此事。羅馬教廷對清政府此舉當然表示歡迎，教宗遂批准遷移北堂並允派使節。

這時法國感覺它的“保教權”已出現了“朝不保夕”的危險，不能不採取對策：一方面，它表示遷讓北堂可以商談，但反對教廷派使。另一方面，法國外交部長富利西奈訓令法國駐羅馬公使白亨向羅馬教廷提出抗議，謂“羅馬如派使節駐北京，就是有傷法國的特權。羅馬教廷與中國素無外交關係，法國代替羅馬教廷訂立保教條約，保護在華傳教士已經多年。羅馬教廷若直接往中國派遣使節，各國將另立教宗而擁戴之。羅馬教廷若是這樣做，法國的‘保教權’固然受到破壞，而教宗之地位亦將喪失。”

根據這樣理由，法國反對羅馬教廷派駐使節，羅馬教廷不敢拂其意，

派遣使節問題遂宣告中止。④

但德國並不因失敗而死心。1887年，山東南部主教安治泰回到柏林後作了德國政府的上賓。德皇威廉二世曾說：“天主教士安治泰回到柏林時常作我的賓客，他以中國各項事情報告給我。”首相俾斯麥當然也予以接待，厚禮相加，並向安治泰提出保證：“今后德國要極力保護傳教事業。”同時還計劃好了破壞法國“保教權”的實際方法，就是德國政府在山東南部要自己提名陞主教。隨即，德國政府就保舉了韓寧嵩（德國海軍隨軍司鐸）為將來的繼任主教。從此法國在中國的“保教權”之一部分就為德國所破壞。1888年，清政府承認了德國在山東南部的“保教權”，自那以後，德國傳教士來中國就不再向法國公使領取護照而由德國公使自行發給。至1891年，羅馬教廷也順水推舟地承認了德國對其本國傳教士有保護權。因此，1898年發生的山東鉅鹿教案，德國遂直接同清政府交涉，並強迫我國割讓膠州灣。

七、法國“保教權”的結束

數十年來法國所壟斷的“保教權”在山東雖然一部分被破壞，但

在其他各省仍完整如故，未有改变。法国的“保教权”一直保持到1906年。在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政府因与本国的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在权力上发生争执，遂于1905年宣布政教分离。从此以后，法国政府不但不再积极“保教”，而且还曾一度与罗马教廷断绝了邦交，于是教廷遂自派传教士而不再用法国护照。翌年（1906），法国公使又正式通知清政府，声明此后只保护本国的传教士。但法国并非真心放弃“保教权”，待内部政教分离的风头一过，它又野心复燃地企图恢复旧日的势力。

事实上，法国的“保教权”虽然在名义上是取消了，但它仍阴魂未散而遗毒犹存。外国传教士依然把中国人民看为劣等民族，并认为中国神职人员只配居于辅佐地位而没有陞主教的资格。1912年，文贵宾（法籍主教）等四个帝国主义分子就曾联名上书教廷，诬蔑中国人民是“猪”，中国神职人员都是“愚钝昏聩”，根本就没有陞主教的资格。在解放前夕的天津教区，当赵振亚神父升任为付主教以后，外籍神父竟说：“中国人不准称付主教，只能称总本堂。”三德里本堂

荷蘭籍神父守道更明目张胆的說：“我不听赵振亚的命令沒有罪，因为赵振亚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当时在中国共有二十个总主教区，但中国人担任总主教的只有三人；全国有一百卅多个主教区，而国籍主教却只有廿余位，并且还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教会内的一切主要职权，仍然是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八、從“保教權”談到 自選主教

根据以上的一些点滴史实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認識到：

（1）天主教在中国的傳播和殖民主义勢力在中国的扩张是一脉相通、声气相連的。天主教一开始傳入中国，就受了帝国主义的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它給我們祖國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災禍，也給中国天主教帶來了莫大的損失。而罗马教廷对此情况則一直是助纣为虐的。

（2）中国天主教的大权一直操縱在帝国主义手里。中国天主教、中国神职人員和教友一直受着帝国主义者的“保护”，中国人信奉了天主教，就必须洋化，就要換

上外国姓名，这正如天津張濟众神父說的：“多了一个教友，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呀！我們能說中国天主教不是长期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中嗎？

(3)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不仅中国人不能担任，而且中国政府也不能提名和批准，而是由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政府来提名和批准，由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来担任。这真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也是我們中国天主教友的莫大耻辱。

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打倒了三大敌人，結束了祖国百余年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状态。但是我們的教会情况又是怎样呢？解放九年来，中国天主教还没有能够和祖国的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形势相适应。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帝国主义分子虽然都被中国人从中国的土地上赶了出去，但过去在中国天主教內窃据了领导职务的一些所謂“主教”們，竟把他們在中国的主教地位和主教名誉也“帶跑”了。以前帝国主义分子們所管理的教区現在全都是代理主教，而梵蒂岡教廷不但不从中国天主教会的利益着想来增加国籍主教以管理中国教务，相反的却倒

行逆施地把中国主教的地位和名誉仍給那些被中国人民驅逐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們緊緊地保留着。試問：这些个教区的代理主教还在代理着誰呢？难道还要代理那些百余年来騎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天主教的神长、教友头上并曾严重地損害过我們祖國和我們教会利益的帝国主义分子嗎？还等待他們卷土重來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决不能容許在祖國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土地上还存留着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天主教会的。为此，中国的神职人員和教友們必須坚强的站立起来，彻底改变中国天主教过去和目前尚存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以求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地自办教会方針的完全实现。

事实很明显，中国天主教只能由中国籍的爱国爱教的神长来掌握大权和广大教友一起来办理。我們再也不能容許帝国主义来提名或批准中国主教的現象还在今天重演！中国主教應該由中国神長自己来选，来圣！在这方面我們有完全自主的权利。

①一例格約合三英里。後來西班牙自動將這線又向西擴了二百七十一例格。

②巴魯主教後來同羅文藻主教於16
77年來中國。

③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6。

④見白亨著：“欽宗良第十三與俾
斯麥”一書。

編者按：本文原載江苏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出版的“會訊”第2号。轉載時我們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訂正。

蚌埠教會的新氣象

蚌埠市天主教會，在周益齋代主教的領導下，大部分神職人員的愛國主義覺悟普遍提高，因此，在教會內不斷地出現了新的氣象。今將從57年以來的事例介紹如下：

57年丰收時，市內機關群眾到郊區幫助農民兄弟搶收，教會人員除老年人外，全部自動參加。當種麥時期，天久不雨，全市人民為了爭取58年的大丰收，進行了抗旱運動，教會人員又都積極參加。當全市人民開展義務勞動時，教會人員又積極地出勤三次，參加挖土勞動。

對於政治理學，他們也是積極的。如聶芳德修女在聯合診所工作，每逢星期一休息。她寧願不休息，也要參加學習；陳利貞修女除參加定期學習外，還要求愛國會每星期給她們修女講述每週重要新聞。對社會事業，神職人員也都積極參加，如崔秀金修女除做好教會事務外，自動要求在居民委員會作基層工作和扫盲工作；譚玉心修士除擔任飼養奶羊外，也自動地參加了扫盲工作。

最近以來，全國範圍內開展轟轟烈烈的除四害、講衛生運動，教會人員做得更起勁。如：為了挖蛆蛹，在糞堆附近吃飯，並且是吃涼飯，喝開水；為了捉老鼠，跑了一二十里路，中午也是野餐。為了清潔衛生，周益齋代主教親自下手帶頭，把自解放以來從未打扫的房間全部翻箱倒櫃，清理一遍，做到室內外窗明几淨。

57年秋季，愛國會為了響應政府號召，使沒有考取學校的青年教友能有學習機會，發動了二位高中畢業的青年教友，計劃开办補習班。由於教會大力支持，房子和傢具等得到解決，因此，補習班很快的开办起來。本年春季，愛國會計劃辦一所幼稚園，教會又能主動地表示贊助，因此，這個幼稚園不久即可實現。（陸蘊輝）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在社會主義教育及反右鬥爭勝利基礎上

天津市舉行全國會議傳達會議

通過重要決議並訂出了愛國公約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天津市于3月14—15日召开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天津市全体神職人員、修士、修女及各堂教友代表等共654人。

會議听取了津市爱国会主委李德培付主教所作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傳達報告”，和張濟众付主教代表津市天主教社会主义学习领导組所作的“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反右派斗争的報告”。

張濟众付主教在报告的开始时說，津市天主教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全国人民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中展开的，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

會議的有历史性的重大決議精神的引导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羅馬教廷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線及教內右派分子的斗争”。他說，“在这次运动中，我們彻底地揭露岀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和它一貫奉行的反动政策，也彻底揭露了隱藏在教內的右派分子的种种罪惡活動。通过了声勢浩大的群众斗争，清算了羅馬教廷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線，摧毁了天津教區反动集團及彻底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斗争取得了輝煌的胜利，它深刻地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辨明了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了人民立場，信心百倍地走反帝爱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張濟众付主教接着報告了津市

天主教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經過：“在全国會議勝利閉幕以後，津市神長教友即積極地投入了以貫彻全國會議決議精神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習是採取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式進行的。從去年9月開始，經過為期兩個月的擺事實、講道理的說理鬥爭，徹底澄清了神長教友們在兩條政治路線鬥爭上的種種混亂思想，反復、深刻地討論了中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在討論中，由於徹底揭露了羅馬教廷一貫奉行反動政治路線的大量事實，暴露了羅馬教廷的反動本質，因而“大家一致堅決表示，中國天主教會必須與羅馬教廷割斷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關係，必須反對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所進行的陰謀破壞活動，中國天主教會必須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另外也討論了全國會議“對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大家一致認為“羅馬教廷的命令是無效的，一致表示堅決支持張士琅代主教”。

張濟眾付主教指出，“在討論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上，會引起激烈的爭辯。有少數忠實執行羅馬教廷反動政治路線的人們，以種種借

口為教廷的反動立場辯護，也有一部分人由於過去長期受帝國主義毒素麻痺，善惡難辨，是非不明，因而在思想上出現了一時的混亂。經過反復的擺事實、講道理，那些思想認識不清的人都徹底的覺悟過來，堅定了人民的立場；而那些堅持羅馬教廷反動立場的人在事實面前被駁斥得張口結舌，理屈詞窮，陷于非常孤立的地位。”

張付主教的報告接着談到了津市教內反右派鬥爭的經過。他說：“在批判羅馬教廷的帝國主義政治路線時，許多神長教友都聯繫了天津教區的實際情況，揭露了天津教區反動集團一貫忠实地執行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命令的種種破壞活動。大家一致認為天津教區的反動勢力嚴重地危害了國家利益，同時也給教會帶來不應有的損失，紛紛表示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存在下去，要求清算這個反動集團的罪行，這就使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朝着更深入的方向發展起來。”

接着，張付主教敘述了天津教區反動集團的罪惡活動，特別指出，“這個反動集團一直受着天津教區宗座總理趙振亞的積極支持”。他並指出，這個反動集團在全國

會議閉幕以後展开了對社会主义學習的破壞活動，他們一面造謠中傷思想有所轉變的神長，一面对堅持反動立場的分子喝彩撐腰；尤其猖狂的是，在去年12月1日，反動集團骨干、右派分子何蘭化在西開總堂借講道為名，公然破壞全國會議，叫囂“一切必須服从教宗”。張付主教說：“這是天津教區反動集團向反帝愛國運動又一次凶猛的反撲，當即激起了全體神長及廣大教友的極大憤怒，風起雲湧地展开了猛烈的回擊。從12月初開始，對右派分子何蘭化進行了嚴肅的說理鬥爭，並追出了天津教區反動集團，又揪出了右派分子楊讓、任若石及回如愚。”

張付主教報告了右派分子楊讓、任若石、回如愚的反動罪行：楊讓奉趙振亞之命打入大修院充當“坐探”，對大修生百般控制，以當“神師”、“訴心”為掩護，灌輸反動毒素，打擊誹謗愛國神長，甚至于卑鄙地以大量的金錢收買、誘騙修生，供其驅使；此外，還與反革命分子徐熙輝勾結，密謀篡奪遣使會的領導權，從事反動活動。任若石咒罵積極參加勞動生產的教友是“不要靈魂了”，任意改變弥

撒、降福的時間，有意識地破壞郊區的農民教友下地生產及教友子弟的學習。回如愚一貫反蘇、反共，經常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破壞歷次運動，誣蔑宗教政策，甚至惡毒地辱罵人民領袖。

張付主教接着報告了鬥爭的經過：自去年12月開始對何蘭化的鬥爭以來，“群眾的眼睛越來越亮，分析能力越來越高，鬥志越來越旺，火力越來越強。”群眾鬥爭的威勢，迫使這個反動集團中的骨干分子，不得不脫離對反動集團的依附，站到人民方面來，揭發出這個集團的大量罪行。其間，又有反動分子向覺悟過來的神長們投寄匿名信，進行恐吓；但是這種無恥的恐吓，不但沒有吓倒站起來的神長們，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的立場，鬥爭意志更加高漲起來。終使反動集團陷入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境地。同時，在鬥爭的高潮中，也吸收了大小修院的修生和一部分修女參加了大會。他們受到了群眾鬥爭的啟發，也紛紛表示與反動集團划清政治上的敵我界限。最後，反動集團的首要以及右派分子何蘭化、任若石、回如愚等，都紛紛表示繳械投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反击天津教区反动集团及右派分子的斗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張付主教最后說：“这半年來的学习和斗争，对我们每一个人來說，都是毕生难忘的。这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更坚定了我們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讓我們与全国人民步伐一致地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

在張付主教报告后，天津教区宗座总理赵振亞，右派分子楊讓、何蘭化，依次在会上作了自我檢查发言，当众承認了自己的罪惡，向人民請罪。（赵振亞发言摘要見第39頁）

許多神长、修士、修女和教友在大会上发言，一致拥护上述兩個報告和全國會議決議。許多在工作崗位上的教友在发言中提出保証，要以工作和学习上的大跃进，来貫彻执行全國會議決議，并向其他教友作友誼的战挑。如：天津第一医院的全体青年修女及青年教友以拥护全國會議決議、比立場、比思想进步、比干勁，向中心妇产科医院和第二中心医院的修女、教友們提出了挑战；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全体青年教友們隨即应战，并提出爭先

进、比干勁、打破八小时工作制，加强政治学习，密切联系各界青年，爭取做一个又紅又專的人民医务工作者的保証；各堂青年教友李艳琴等36人提出（1）站稳爱国主义立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貫彻全國會議決議，（2）积极参加各项政治理論学习，（3）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和学习崗位上，拿出青年应有的朝气，鼓足干勁，克服困难等保証。天津教区大小修院的修生也以認真执行全國會議決議、与羅馬教廷割断政治經濟联系、加强政治学习、踊跃参加社会活动、密切联系各界青年等保証，向全国各地修院提出了挑战。会場空气极为热烈。

最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天津市傳達會議的決議”（全文見第29頁）和“爱国公約”（全文見32頁）。

會議期間，天津市人民委員婁灝先秘书长和市人委宗教事务处閻鐵处長应邀到会講話。他們祝賀天津市天主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鼓励全体神长教友在反帝爱国、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廣州教區選出陳亦新任主教

广州教区神长，已于3月5日，在广州市石室主教府投票选出了付主教陈亦新为广州教区正权主教。

自从2月5日广州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邓以明以后，广州教区的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友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学习，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深刻认识到广州教区的领导职位，过去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奴才邓以明所窃据，他忠实执行梵蒂岡的反动命令，不但严重危害了国家，而且也玷污了教会。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割断同罗马教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贯彻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纷纷表示一定要自选主教。

选举是经过神长和教友代表在3月3日集会，进行反复的酝酿、研究以后举行的。3月4日下午与会的全体神长推选了连明德、刘谦常、黄鸣潮、谭干超、吴球光五位神父组织选举主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主任连明德神父主持神职人员会議，就选举主教的意义和若干具体問題，展开深入討論，做到各抒己见，一致認為必須同罗马教廷划

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在目前选举主教是完全适时的，符合广州教区广大教友的愿望，当即决定于5日上午举行选举。

届时24名神长齐集于主教府内，并有教友300多人闻讯前来观礼。选举时，由刘谦常神父检票，吴球光神父唱票，黄鸣潮神父记录。当投票结束，谭干超神父宣布陈亦新付主教以22票当选为正权主教后，会场热烈鼓掌。接着由顏适然、陈惠民、吴蔭漁、呂明广四位老神父陪同新任主教在耶稣圣心像前宣誓就职，连明德神父受全体神长委托，向新主教献上权戒，神父和教友代表十余人亦趋前献花。是时炮竹齐鸣，到会神长教友无不欢欣鼓舞。

广州神父刘谦常和佛山神父刘德真，分别代表市内外神职人员致贺词。刘谦常神父說：“自选主教，是教区的一大喜事。陈主教当选，是全体神父和教友反复多次商討所得出的结果。今后在新任主教的领导下，我們一定要做到爱国爱教，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德

真神父說：“处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大跃進的時刻里，天主教會也必須堅決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對教會人事的支配，維護獨立自主的尊嚴。自選主教是廣州教區歷史上的創舉。我們今后一定要热爱祖國，做一个爱国爱教的神職人員，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六亿人民團結一致，迈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廣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主任陳志雄也代表全市教友在祝詞中表达了教友繼續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意願。

新主教陳亦新在宣誓就職後講話。他号召全教區神長群策群力，站穩爱国立場，反对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略我国的阴谋。他

說：“自知德才菲薄，責任重大，感謝大家愛戴，推选我为教區正权人，今后一定要依靠全教區神長教友的協助，共同把教會办好。我許願一定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和大家堅決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做到爱国爱教，严防帝国主义企圖繼續利用教會，危害祖國，危害人民，玷污教會。”陳亦新主教并當場宣布任命一批神長的职务。在新主任教宣誓就職之後，神長和教友紛紛步至新主教膝前，恭吻其手上所戴的权戒。下午到主教府向新主教道賀的教友絡繹不絕。傍晚，由新主教主持，在石室天主堂举行了隆重的謝主大降福。

皮漱石總主教電賀陳亦新主教

廣州教區神父自選了陳亦新當正權主教後，各地的神長、教友的賀電、賀函如雪片飛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東北教省總主教皮漱石也特電視賀。電文如下：

廣州市石室天主堂陳亦新主教：

欣悉你當選為廣州教區正權主教，我謹代表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並以我個人的名義，向你致以衷心的擁護。我們在祈禱中將不斷的懇求仁慈的天主降福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尽好善牧的重任，清除鄧以明的反動影響，並發動全体教友積極參加祖國社会主义建設，及堅決獨立自主，办好教會。祝神形康泰！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
東北教省總主教 皮漱石

（陳方）

太原教區選出李德華任主教

3月5日开幕的太原市天主教友第三屆代表會議到8日勝利閉幕。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對羅馬教廷無理控制中國天主教的主教的人選，表示了極大憤慨。在討論中，徹底揭露了羅馬教廷的反動面目，認清了它的反動本質。一致表示要與羅馬教廷割斷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一切聯繫，並要堅決地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並由太原教區全體神長選出了德才兼備、愛國愛教的李德華代主教為教區總主教，結束了118年帝國主義的奴役和控制的歷史。

3月7日晚6時，全體神長身着白衣，恭集聖堂，唱“伏求聖神降臨頌”後，在聖體台前開始了莊嚴隆重的選舉儀式。參加投票的神長共23人，結果李德華代主教以22票當選為太原教區正式主教。當場由諮詢長邢化民神父征詢了當選人意見，李主教表示願為天主光榮與靈魂的利益而肩負重任，諮詢長歡喜答稱：“感謝天主。”在悠揚的琴聲伴奏中，唱起“讚揚天主聖歌”。接着，李主教手按聖經，宣

誓就任太原教區正權主教職務。誓詞略稱：“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但要與羅馬教廷堅決割斷一切政治經濟聯繫，今后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帶領太原教區神長教友，一心一意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此時諮詢長邢化民神父代表諮詢會向李德華主教獻上權戒和杖。李主教身着主教禮服，走上寶座，接受了神長們的親權禮。禮畢出堂，男女教友擁上親權，求主教降福。

9日（主日），太原天主堂熱鬧異常，呈現了一片歡樂氣象。早9時由李德華主教舉行了首次主教大禮彌撒。彌撒中由張信神父講道，他說：“現在到了自選主教的時候了，八、九年來羅馬教廷堅持帝國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當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企圖繼續利用中國天主教做它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工具，這是毀滅中國天主教的罪惡陰謀，我們必須予以沉重的回擊，實行獨立自辦，以保障中國聖教會的光明前途。”正午12時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政府首長與

朔县、汾阳、榆次、潞安、新绛等五个教区的代理主教亲来参加。大同教区代理主教郭印富和山西省天主教友爱国会以及其它许多教会单位，纷纷来电来信，表示热烈祝贺。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支应遵付主席、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刘舒侠付市长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们除表示祝贺太原天主教会获得了独立自主、自选主教的胜利外，并勉励天主教友与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汾阳教区代理主教閻培仁、代表朔县等五个教区，向李总主教与太原教区全体神长教友

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支持，他说：“太原教区是山西省天主教会的‘首席教区’，继成都、苏州、济南三教区之后，山西太原首先选出首任国籍主教，给我省天主教各教区树立了光輝的榜样，我们要向太原教区学习。”太原教区神长、教友、修士、修女相继致詞祝贺，教友儿童献了花，一致表示要在李总主教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共同办好教会，今后要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爱国会的协助下，争取早日自圣主教。

（太原市爱国会通訊組）

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勝利閉幕

駁倒了右派言論，成立了省愛國會，確定了
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自選主教的方針

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自本年1月9日至3月5日在郑州市举行。會議前举行了5天預備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代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122人。

會議期間，學習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听取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各項傳達，并邀請中共省委統戰部田付部長、省人委蔡秘書長

講話。會議主要內容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和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決議。

代表們就幾個根本重要問題，進行了大鳴大放，並熱烈地展开了大爭大辯。絕大多數的代表提出：中國天主教友必須衷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愛社會主義祖國是我們的天職，中國天主教會的前途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是緊

密地結合在一起的；要繼續深入开展反爱国运动，同罗馬教廷坚决划清敌我界限。但以馬昌仁（原河南总修院院长）；郭好信（卫輝教区代主教）。斯德辰（南阳教区代主教）。田树声（駐馬店教区代主教）等为首的右派集团，借口“宗教信仰”、“荣主救灵”、“教規教义”，向代表們进行了惡毒攻击，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論。他們說“教宗的一切措施都是为荣主救灵，我絕對服从”；“爱国会是政府消灭教会的工具，爱国会是裂教的，我坚决反对”；“教宗反对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不信神”。他們还惡毒地攻击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肃反政策，把反革命罪魁胡品梅逮捕的問題說成是“宗教問題”。右派分子郭好信为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牛金祥、刘良喊冤，說他們是“好人”，企图翻案。他們公开的叫囂“北京會議是裂教”。

这些右派分子为了实现其罪恶阴谋，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秘密串連活动，亦曾多次召开秘密會議，汇集情况，研究对策，并訂出了“打击进步，爭取中間，团结落后”的惡毒方針。利令智昏的右派分子們曾狂妄已極地說：“我們的力量很

大，这次會議的結果將是不欢而散，不了了之。”他們向党向人民进攻，妄图推翻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的阴谋，是蓄謀已久的。早在北京會議期間，就四出活動，打探消息，勾結串連。此次會議前，以馬昌仁为首的总修院內右派集团，为破坏这次會議，曾停課五天，針對着會議要討論的反帝爱国、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独立自主等重大問題，研究制出进行破坏的荒謬言論，打成拉丁文和寫成中文，派人出去散发，并又帶到大会上來。

右派分子們顛倒黑白的荒謬言論，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向會議的进攻，激起了代表們的憤怒。大家用摆事实講道理的方法向他們展开了坚决严肃的說理斗争。代表們以教廷从事反动政治阴谋活動的大量事實駁倒了右派分子所說的“教宗无政治立場”的謬論；并以馬昌仁圣黑神父、秘密接受外資津貼、煽動其他教区神长退出爱国会等反动罪惡，戳穿了他們在口头上“拥护人民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們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真面目。

代表們以亲身体驗到的事实，在发言中指出：解放前，国弱民貧，受人欺侮，人民的生活是飢寒交迫，性命是朝不保夕。中国神长在自己祖國土地上傳教，位列三等，如寄人籬下，有苦难言。国民党反动派对教会蹂躪摧残，教会毫无保障：在郑州，一个国民党軍官，一下就拐跑了兩位年輕修女；洛阳大堂鐘樓，就是被国民党軍206師和帝国主义分子同意炸毀的。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領導全国人民走上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生活提高，人民是国家主人。我們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受到尊重和保护。政府帮助教会整修圣堂，解决神职人員和修女教友們各方面的困难。

我們从爱祖国爱教会的良知出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經過一个多月的反复爭辯，代表們把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言論驳得体无完肤，暴露了他們的反动本質；也提高了代表們的政治觉悟。动摇不定的人，站穩了立場，認清了大是大非，連被他們欺騙利用的人也已觉悟过来。右派分子在真理和事實面前，理屈詞穷，四面楚歌，不得不低下头來認罪。

代表們一致認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必須彻底割断在政治上、經濟上与教廷的一切关系，在教务上、人事上不能由它任意干涉和摆布。大家認為：現在就是我們教会的紧要关头，如仍听任教廷在教务上、人事上任意干涉下去，这既是負众人之望，也是获罪于天主。那些因違法犯罪而被驅逐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法办及畏罪潛逃的反革命分子，他們早已喪失了領導我們教会的权利，我們也決不承認他們是我們教会的领导人。要坚决貫彻和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主教的方針。任何犹疑觀望，都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利用我們教会的厄运。

會議期間，与会全体代表对教廷又一次利用“祈禱总附意”来破坏我国的活动，表示了无比憤慨，一致严正的对梵蒂岡提出了抗議。对披着宗教外衣潛藏在广州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邓以明，一致发表了声討書：坚决拥护人民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邓以明的賢明正确措施，全力支持广州市神長教友爱国爱教的正义斗争。

在代表們爱国爱教正义的呼声下，經各教区負責神長共同研究決

定，由开封总主教区何春明代主教在会上庄严地宣布了：撤銷了一貫牺牲教会利益、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破坏新中国的反动透頂的右派分子馬昌仁的总修院院长职务。

在統一認識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和“河南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关于支持張士琅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抗議羅馬教廷的通電”。

會議还通过了“河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成立了河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选出代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33人为委員。在全体委員會上，选出何春明代主教为主席，陈天佑、郗民援代主教、傅甸民教友为付主席，姜建文、李中奎、孟紫坪分任正、付秘书长。

(姜建文)

青海省代表會議勝利閉幕

青海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从本年1月6日开始，至2月10日胜利閉幕；历时35天。會議是分为兩個阶段进行的，先举行了32天的預備會議，后举行3天的正式會議。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神父、修士、修女、教友等，共計33人。

預備會議期間，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件，結合着討論了兩条道路的問題、反帝爱国問題、肃反問題、中国天主教与教廷的关系以及中国教会独立自办的問題、宗教政策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采取了大鳴、大放、自由爭辯的方式，对每个問題都进行了热烈的討論。

通过討論，大家都認識到：爱国是人民的天职，天主的誠命，是有功勞的事；不爱国是有罪的、可恥的行为，是六亿人所不能允許的。并且一致肯定要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及人民政府，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羅馬教廷处罚反帝爱国的神长教友、干涉中國內政、破坏中国教会的行为，代表們一致反对，并認識到，我們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羅馬教廷的領導，但在政治、經濟上，要断然与它割断关系；中国天主教会由中国的神长教友自己来办。

在大鳴大放当中，揪出了右派分子李临瀛。他利用會議的机会攻

击土改政策，替反革命分子段文輝喊冤，煽动教友向农民倒算，并說

什么“帝国主义的罪行我沒見”，

“爱国我願意，爱国会我不贊成”等等反动言論。絕大多数代表对他的反動行为，表示极大的憤慨，紛紛摆事实，講道理，进行分析駁斥、严厉斗争，使右派分子詞穷理屈，終于向代表們低头認罪。

正式會議开始后，由出席全國會議的代表張文煥神父傳達了全國會議的精神与決議等。會議并邀請了省委統戰部长冀春光講話。省宗教事务处处长向全中也在会上講了話。代表們通过討論后，都下定决心，为彻底貫彻大会的決議精神而努力奋斗！

（張文煥）

各地傳達簡訊

西安 陝西省西安市天主教友愛国会，于2月27日至3月1日間举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傳達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陝西省傳達會議的精神。通过討論，出席會議的61名

代表一致拥护全國會議的決議和对教廷的抗議。

會議对西安神哲學院和聖心女修院过去不爱国的情况表示了不满，指出：修道院必須培养出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員，修院应进行彻底整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女修院也必須改变过去的情况，參加反帝爱国运动。會議还斥責了右派分子劉敷道、張肇輝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動和劉敷道窃取教区代主教职务的惡劣行為。代表們一致拥护新选出的姬懷讓代主教。（西安市爱国會）

襄樊市 湖北省襄樊市，于本年1月6日至18日間，进行了以傳達全國會議為主要內容的社会主义学习。参加学习的有易宣化主教及神長、修女、教友等40余人。

在学习中，代表們对全國會議的文件及有关重大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对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对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劉子漁（神父）、張庆云（修女）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論进行了駁斥。在大家义正詞严的批判下，他們不得不向真理低头，当众悔过，作了初步檢討。（新生）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天津市

傳達會議的決議

1958年3月14日至15日，在天津市举行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654人，听取了李德培付主教关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傳達報告和張濟众付主教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反右派斗争的報告以后，一致認為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是中国天主教会划时代的會議，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作出的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爱国，与羅馬教廷割斷政治上、經濟上的关系以及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主等重要決議，都是具有偉大的历史意义的，決定了中国天主教今后的道路；而中国天主教友爱国會的誕生，更标志了全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參加會議的代表一致表示拥护并坚决貫彻执行“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會議还討論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对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抗議”，一致表示拥护这个抗議，譴責羅馬教廷這項旨在干涉中國內政的反動措施，堅決支援上海教友的正义斗争。

會議認為，爱国是人民的神圣職責，又是天主的誠命，我們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剝削、消灭貧困的最优越的制度，是六亿人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道路。解放几年来，我們亲眼看到在党的領導下，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亲身体驗到，我們的信仰和宗教生活也受到人民政府的确实保护和尊重。因此，我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堅決走社会主义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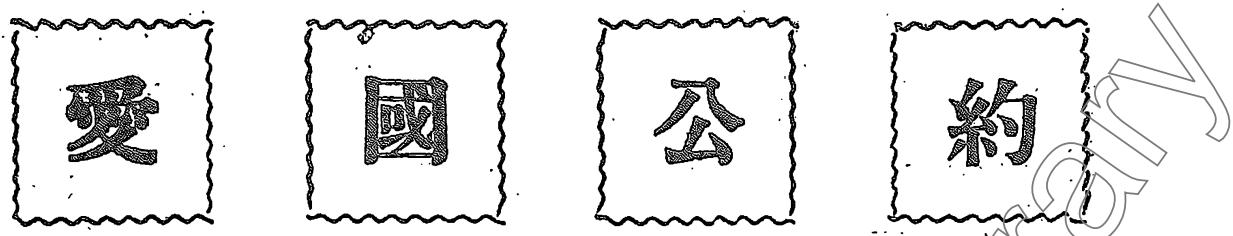
會議認為，中國天主教會曾長期被帝國主義控制和利用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尤其在解放後，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更瘋狂地向新中國進行許多破壞活動，煽動教友反抗人民政府，這是與羅馬教廷一貫奉行反動的政治路線是分不開的。會議討論了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一致認為：中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是涉及到兩個根本對立的政治立場的問題，羅馬教廷一貫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一貫敵視新中國。羅馬教廷承認台灣蔣介石集團，派了被我國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駐在台灣，繼續進行破壞新中國的陰謀活動，同時接連不斷地發出反動命令，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天主教友反帝愛國運動，打擊愛國的神職人員，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便是一個顯明例子。羅馬教廷為了達到反動政治目的，竟然不惜犧牲中國天主教會的利益和上海教友的靈魂，否認張士琅上海教區代理主教的合法權利，授予所謂“和平通功”者以“特權”，陰謀分裂上海教區，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們反對羅馬教廷的這種反動的措施，並堅決表示：我們決不接受羅馬教廷發出的任何形式的政治命令，羅馬教廷對於參加愛國活動的中國神長教友的任何處罰，也都是非法的，無效的，不能接受的。我們必須徹底與羅馬教廷割斷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切聯繫。

會議一致擁護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關於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通過討論，大家一致認識到目前我們的國家是一個獨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天主教會也應該徹底擺脫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的狀態，否則是與我們國家的獨立地位不相稱的。過去羅馬教廷基於反動政治立場，任意干涉中國天主教會的正當的教務，非法剝奪中國天主教會的應有的權利，並由於它的種種反動措施使聖教會蒙上了極大的污點，嚴重地損害了聖教會的利益。因此，為了徹底擺脫帝國

主义的控制，拒絕羅馬教廷的无理干涉，永远結束教会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天主教会必須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中国天主教会只能在不違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与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关系。我們認為圣教会應該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但在宗教事务上，却完全應該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特别是在人事問題上，羅馬教廷基于反动政治原因，造成中国天主教百余教区而正权主教寥无几的极不正常現象，严重地影响了教务的进行。对此，我們主張应由中国神职人員自选自圣爱国爱教、才高德劭的神长充任主教，便于教务的正常开展。中国天主教会應該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并不違背至一、至圣、至公的精神。我們有充足的信心將中国的圣教会办好。

會議滿意地指出：津市神长、教友反对天津教区反动集团及教內右派分子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非常巨大的。长期以来，这个反动集团把持教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右派分子楊讓、何蘭化、任若石、回如愚等一貫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他們的罪惡活動严重地損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津市神长教友們在斗争中剝掉了他們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假面目，露出了他們的丑惡面貌，从而使津市神长教友提高了思想觉悟，辯明了大是大非。天津教区反动集团已完全被打垮，曾經积极支持天津教区反动集团的天津教区宗座总理赵振亞也表示了低头認罪，并保証今后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錯誤，表示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堅決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拒絕羅馬教廷的任何政治命令。會議号召全市神长教友，应彻底肃清教內右派分子过去所散布的反动影响，坚决与他們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并应繼續提高警惕，严防任何反动分子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

我們深信，只要神长教友站稳爱国立場，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我們的正义事業一定获得胜利，天主必定降福我們。 1958年3月15日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思想大跃进的浪潮中，我們天津市天主教神職人員和全体教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津市天主教界經過了五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派斗争，使我們深刻地認清了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彻底批判了羅馬教廷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綫；我們决心割断与羅馬教廷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联系，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我們彻底地划清了与教內右派分子、反动分子的敌我界限，扫除了爱国爱教道路上的障碍，更坚定了人民立場。我們受到全国人民大跃进的鼓舞，决心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上，再掀起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跃进。

我們的口号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誓死効忠于社会主义祖国！

我們提出来比爱国立場，比政治理学，比参加劳动，比勤儉朴素。我們訂出如下的爱国公約：

一、比爱国立場：我們天津教区保証全面而彻底地貫彻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我們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們积极地參加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运动；我們坚决拒絕羅馬教廷的一切反动政治命令，彻底貫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針，坚决支持自选自圣主教的正义行动；我們保証以实际行动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遇到任何困难都决不动搖。我們在坚持以上的正确的政治立場的前提下

下，当尽力作到加强团结，共同进步，要求进步的帮助落后的，落后的追上去，进步的更前进。

二、比政治学习：我們保証坚持持久性的政治学习，决不作时代的落伍者。我們在学习中要繼續从思想上破帝国主义毒素，立爱社会主义祖国观念；要經常敞开思想，接受新鮮事物；要多看報紙杂志，增进新知識，以求得思想不断地进步。

三、比参加劳动：神职员除努力尽到傳教本分外，要根据自己的所长和条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及参加体力劳动，如除四害、綠化、义务劳动等。修道院要搞些手工业生产，爭取逐步实现勤工儉学的方針。修女院原有的生产事业亦应繼續巩固和扩大。

四、比勤儉朴素：我們坚决克服奢華浪費現象，保証过勤儉朴素生活。

五、我們号召神职班以外的广大教友群众，要与全国各阶层人民一道积极参加祖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要以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作好自己崗位工作，并要以大跃进的精神不遺余力地供獻出自己的力量。教友们在劳动、工作、生活中，不应借口信仰而特殊化，不能以此破坏法紀和違犯劳动紀律。各堂口的宗教活動時間，亦应尽量作到不影响教友們的生产活动。

神职员為保証作到以上各項，每人都要訂出个人保証，并經常进行檢查。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

天津教區全體神職人員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全體修道生

天津 市 各 修 女 會

1958年3月15日

在大躍進浪潮中的各地神長教友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和思想大跃进的浪潮中，各地神长也纷纷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以具体规划或实际行动表现了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寧波神長教友 訂出躍進規劃

月6—7日宁波市政协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座谈会上，提出了“宁波市天主教社会主义大跃进的规划”，规划中订出跃进指标和保证如下：
①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宁波市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使每一个天主教徒普遍地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热爱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②积极投入生产大跃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全市神职人员和修女共30人，除年老力衰和长期患病者外，其余22人全体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其中自食其力者13人，保证一年内实现，并且紧缩自用房屋，支援生产建设；③坚决从全国六亿人民福利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做到在不妨碍社会主义大

浙江省宁波 市的神长教 友，在今年3

生产的情况下安排宗教生活；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各项爱国运动，如除六害、讲卫生运动，保证种树500株，并做到包种包活包长大；⑤加强政治学习，参加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思想，凡有劳动力的，参加工农业体力劳动，每人每年至少50天。（庄中汉）

阜陽教會訂出 生產自給計劃

安徽阜阳县天主教会负责人，在阜阳专署宗教事务科召开的天主教、基督教生产自给会议，一致批判了过去依靠薪金、捐献、房租维持生活的不正确思想，订了生产自给计划：要打破陈规，宗教生活要过得更美满，付业生产要来个大跃进，争取在1959年或1960年，教会完全可以自养或有余剩，以实际行动粉碎帝国主义的造谣和诬蔑。（霍牧声）

保定神長教友 植樹綠化堂院

在市爱国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植树造林工作，各堂共植树 271 株。在植树之前，爱国会召开了各学习组长的座谈会。会上，各堂教友纷纷表示要在植树运动里除完成或超额完成本街道上分配下来的植树任务外，还要协助神长们在堂院中植树。会后第二天，总堂侯鸿文神父通知了教友們，教友們便从清早就携带工具到堂植树。侯神父亲自挂帅，一面指挥，一面参加劳动，不到三小时的时间，就把堂院的空隙地方全植上了一行行的树。此外，西堂李道宁神父、南堂孟繁望神父、淑慎院賈文質院长、若瑟院李鳳齋院长，也都亲自下手，带领修女和教友們在堂院內植了树。

(保定市爱国会)

漢中神長教友 踴躍參加抗旱

的大旱灾，許多地方的庄稼連苗儿都干死了。汉中市的首长們，响应中央提出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亲自动手，带头抗旱。汉中的神长、修女、教友們，在何超权

保定市的 神长教友，最 近在市爱国会

代主教的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抗旱运动。許多神父、修士、修女、教友，除了事先提出保証外，更在实际工作中超额完成了保証条件。特别是善导会的刘光賢、周定安修女，更抱病参加了劳动。

(左讀室)

福州婦女教友 革命干勁十足

妇女在一起，鼓起了革命干勁。在今年 3 月 7 日举行的福州市妇女大跃进誓师大会上，她们提出了决心書：保証要貫彻“勤儉建国、勤儉持家”的方針，把智慧与力量全部献給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并保証要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全民整风运动，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响应政府号召，做好节约工作。除了保証完成在居委会里面的积肥、消灭八害、种树造林、收集廢品和扫盲工作外，还要另外积肥 200 担以上，捕鼠 200 只，消灭蚊、蝇、蟑螂 500 合，种植香花 100 株以上。

又，福州市神长教友，于 3 月 6 日前往“八一”水库工地，参加了义务劳动。(同)

**陝墳神長修女
展開躍進競賽**

陝墳教區
神職人員、修
女、教友 53

人，在內蒙河套行政區人民委員會領導下，于本年3月1日開始了社會主義學習。3月8日全體學員和所有領導干部共同慶祝了“三八”國際婦女節。因為今年正是我國生產全面躍進的一年，大家一致感到今年的“三八”節更具有特殊的意義。為表示慶祝，8日晚上舉行了慶祝晚會，會上除由領導學習的干部同志報告在目前我國全面躍進的新形勢下和慶祝“三八”婦女節的重

大意義外，參加晚會的全體學員，一致表示，通過這次社會主義學習過好社會主義關，爭取思想上和反帝愛國上大躍進。修女們並提出今后要在反帝愛國、學習、勞動生產、響應政府號召、消灭四害等方面和所有的神職人員競賽，以促進教會在反帝愛國運動中的全面躍進。此外，在晚會上，神父修女教友們自動捐獻了45元，買了鋤10張、籠頭16個，贈給下放干部，以支援他們參加勞動鍛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熱情。（郝威）

站在農業生產大躍進前列的王慶喜修女

繼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遼、吉、黑三省傳達會議之後，黑龍江省海倫縣海北鎮的傳達會議於1958年1月26日召開，2月9日已勝利的閉幕了。與會代表受到一次極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在52位代表中，在農業戰線上的有40人，占代表總數77%。這部分代表不僅提高了社會主義覺悟和堅定了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而且更增強了生產勞動勁頭。因此一致表示，今后在農業生產勞動中，以實際行動來

表現愛國愛教，作國家的好公民，天主教的好教友。

海北鎮在縣委“決戰三十天，突擊備耕生產”的響亮號召下。為支援農業生產大躍進，開展了突擊糞肥運動，爭取百分之百的土地送滿糞，保證豐收。在這一運動的高潮中，海北鎮黨政首長、機關干部、企業職工、學校教師和學生、農業社的男女社員（社員中百分之八十是教友）都爭先恐後、成群結隊地進行愉快的勞動。就在这萬馬

奔騰、聲勢浩大的突击糞肥的队伍中，人們可以看見天主教修女王庆書，短衣、短裙、小打扮，手持短鞭，在春雪初融的泥濘車道上，愉快地、勁头十足地趕着滿載糞肥的二牛花輪車，走在送糞行列的前头。

王庆書修女从1957年就参加了农业社，从事生产劳动。这次在她的带动下，她的生产队共有17名妇女（均教友）参加了送粪。除她本人赶的一輛牛車外，其余16名妇女用人力拉着七張爬犁送粪。她们起早貪黑，不管风吹和道路泥濘，每天送粪六次，最后为争取提前完成任务，达到每天送七次。有一天，在生产队院內卸車时，由于另一个赶車的开車不慎，挤破了王修女的手指头，她并沒因手破出血而歇工，用布包好后，第二天还是坚持干下去。

她不但劳动好，而且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例如为庆祝和迎接生产大跃进，春节搞秧歌时，她积极帮助組織和給扭秧歌的妇女化裝等工作，因此受到表扬，博得了群众的好評。在今春农业社改选中，她被选为女生产队长。目前，她正领导着生产队的妇女进行选种备耕，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

（崔岐、張桂禎）

大躍進！

郭樹民

我們青年
是建設社会主义的中堅。
我們的意志象原子破冰船，
航行在北极的大冰川，
风雪无阻，走向前！
冰見我們自行瓦解，
雪見我們滾滾騰翻，
风見我們也躲躲閃閃。
任凭他什么阻碍、艱險，
擋不住我們跃进的心願，
我們要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
在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竞赛
热潮上，
抖擞精神，快馬加鞭。

☆ ☆ ☆

我們青年
是建設社会主义的骨干。
我們的意志象噴氣直升飞机冲向中
天。

航行在廣闊的宇宙間，
所向無敵，飛向前！
雲見我們招手微笑，
雨見我們熱情款款，
霧見我們也不打自散。
管他什麼峻嶺、高山，
擋不住我們躍進的心願，
我們要一而再，再而三，
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基礎
上，
保證質量，趕在前面。

☆ ☆ ☆

我們青年
站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前線。
我們要向資本主義世界挑戰；
我們要在今后十五年，
在主要的工業產品上趕上英國，或
把它拉在後邊。
讓我們每件河流都修上大、小型水
電站，
讓我們每處礦藏都出頭見見面，
讓葱綠的森林長在戈壁沙灘，
讓貧瘠的土地變成千斤的高產田，
讓工廠的煙囪遍地冒出青煙，
讓農民年年有更大、更高的丰產，
讓工人季季有超額的任務作完，

讓大躍進的勝利旗幟在各各單位到
處插滿，迎風招展。

☆ ☆ ☆

讓英國在我們後邊跟着喘，
讓美國對我們望洋興叹，
讓法國看我們干瞪眼，
讓帝國主義頭焦額爛，
讓資本主義一籌莫展。
我們要在生產的規劃、指標上，划
上一條條躍進的紅線。

我們要鼓起革命干勁，叫生產率一
再提高，新紀錄不斷湧現。

我們要學習生產技術、知識，由外
行變內行，做到“又紅又專”。
我們要做到整風生產兩不悞，兩個
高潮互相推動，並肩的干。
我們不向困難低頭，要找窍門、挖
潛力，埋頭鑽研。

蘇聯光輝爛的今天，
就是我們即將到來的明天。
我們要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建成一個世界上最美丽、最幸福的
乐园。

我們要讓祖國的錦繡河山，
變得更壯麗、更燦爛、更絢爛。

1958年3月6日，寫於天津神哲學院

我向人民請罪

天津教区宗座总理 赵振亞

各位神父、教友：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罪过的人，我以慚愧的心情交代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以及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罪惡行为，并向人民請罪。

我以下只就我的主要罪行作一簡單交代：

一、我一貫效忠帝國主義，執行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線，進行了許多破壞活動。

由于我一貫為帝國主义者效忠，执行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命令，对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惡。早在解放以前，我便坚决依附帝国主义势力，为帝国主义効命。如1948年末，我奉帝国主义分子文貴宾之命，組織了反动組織“圣母軍”。我先后发展了“圣母軍”成員30多人。李緒武、王克明、王天賞等罪大惡极的反革命分子都是我領導会中的骨干

分子。

我与“圣母軍”头子、帝国主义分子柏恩也有勾結。1950年，我参加了“圣母軍”总部召集的秘密會議。會議的参加者，全是“圣母軍”的首腦分子，如反革命分子肖永新等人。會議的內容，是为避免政府取締，阴谋將“圣母軍”改名为“圣母慈愛祈禱會”，轉入地下活动。

1951年1月13日，我曾受帝国主义分子文貴宾的指使，帶着由帝国主义分子郑化民起草的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文件“中国全体主教声明”（拉丁文的）到南京見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請其鑑定，批准后，印发全国各教区。这个影响到全国的反动措施，是由我亲身参与奔走的。我到南京之后，又奉黎培里之命轉赴上海見他的秘書、反革命分子陈哲敏共同計議那項阴谋。后来那个反动文件經“天主教教務

协进会”印发全国，对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在上海期间，我又会見了曾組織“还乡队”的反革命分子范保祿，并由他帶我見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我向龔彙報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情况。

此后，我曾經屢屢地暗中向被驅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表明我忠于帝国主义的态度。如1952年，我与被驅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夏雨田見面，并把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情况向他彙報了，还請求他向国外捎口信。我向他表示过絕對忠实于教廷的帝国主义路綫；表明我之参加爱国会是无可奈何等等。1955年，帝国主义分子毕納清出境前，及帝国主义分子包某（正定教区法籍神父）在过津离境时，我都特意前往拜訪、求教，除向他們彙報天津的情况外，并請他們在国外給我解釋解釋我的处境。

二、我一貫勾結、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一貫勾結、支持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远在解放前，我就曾积极支持了帝国主义間諜分子雷震远所組織的反动組織“民众建国协进会”。我积极支持

反革命分子刘益民組織反动武装部队，抵抗人民解放军。

我与反革命分子張思謙密切勾結。自天津反帝爱国运动兴起直至他被捕时为止，我一直受他的指使，对反帝爱国运动进行极为恶毒的破坏活动。如在1951年9月間，我曾与他密議过阻擋爱国神长对帝国主义分子雷鳴亮、恩滿德的控訴。他的指示增加了我的反动决心。我曾即时召集全教区神长开会宣布誰要出席控訴會就L pso facto suspensus，就是應受絕罰。后来我还多次从他那里接受过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指示。

繼反革命分子張思謙之后，我又勾結了反革命分子周汝愚，我們在隱蔽地点秘密会晤，共同策划瓦解爱国运动、反抗政府的阴谋。更严重的是1957年9月間，周被捕以前，曾秘密来津兩次，均与我密約，共同誣蔑北京大会，誣蔑赵振声主教等等。我还与反革命分子張本篤、徐熙鐸相依为命，曾共同策划打击爱国神长。

三、我懷着對黨和新社會極端仇視的心理，一貫進行造謠破壞活動，煽動教友反對黨和政府。

几年来我一直站在帝国主义反动立场上，怀着对党和新社会极端仇视的态度，造谣破坏政府及各大政治运动，特别是破坏宗教政策。我曾不止一次地诬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两套”，城市一套，农村又一套。我利用“讲道理”的机会破坏宗教政策说，教会有了“患难”，作补贖吧！肃反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被捕后，我又借“讲道理”机会跟教友说：有人“出卖”神父。1955年肃反学习时，学习有关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材料，我操纵许多神父一不发言，二不签名，并且向政府发动进攻，我公开表示“不能学”，还威胁神父们说，“谁良心平安就学，别忘了龚品梅是主教。学这些文件犯法典120条”，其目的是以宗教为口实，包庇反革命分子龚品梅。

我还借神功之便，阴谋煽动教友退团，瓦解青年团组织。1954年，我在神功后给一个年轻教友出谋划策，令他以不听团课，要消极下来，表现落后，使他达到退出青年团组织的目的。在政治上我犯罪，在教会方面，我违反了听神功的章程，不该利用办神功机会搞别的事情。

我为制造紧张空气，说政府迫

害宗教，教难临头，煽动神父、修生们不满政府，我曾以宗教形式拉拢、驱使他们。我选择张本篤、张博雅、苗印川、傅兴霖、何蘭化等神父，还有大修士们，让他们轮流守大斋，拜苦路，作“补贖”，为教区求“平安”。

四、我自始至终地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到处拉拢串连反动分子大举进攻。

1951年，我与徐英武至保定为教区进行登记时，与反动出名的范学淹主教交换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意见。我们的结论是：不可太进步，以免教会利益受损失。当时范还给我撑腰打气说：该作的就作，不该作的（指爱国活动），说什么也别作，要“勇敢”些，等等，更助长了我的反动气焰。同年，我召集天津神父们开会，计划停止给爱国人士们听神功。为了进一步地破坏爱国会，我曾布置赵锡藩、李东山等人（爱国会委员），在开会时“尽量驳斥爱国会领导人的意见”。

1953年在爱国会组织学习时，我借故加以破坏，给各堂口神父下通知，告诉大家不要参加学习，结果便使神父的政治学习从此停顿了

很长一段时间。

1955年4月，我反对、破坏爱国运动的气焰达到十分嚣张的程度。我阴谋想摧毁爱国运动，打击爱国会，于是就与反革命分子张本篤和反动分子何蘭化等密谋破坏当时即将召开的第二届教友代表会议。我准备出命神父教友不许参加。更阴险狠毒的是给爱国会全体委员及工作人員以絕罰——开除通功的处分。这个阴谋虽因故未逞，但我余怒未息，积极阻擋了我所能阻擋的人参加代表会，已参加会的个别神父，在我的煽动下，也中途告退。

五、我一貫打擊愛國神長教友，無所不用其極。

我对爱国神长教友视如仇敌，几年以来，我利用各种机会，恶毒地誹謗他們，迫害他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方面的罪惡，已經无法估計。

李德培付主教在解放以后曾多少次帮助我进步，但我仇視他，誣蔑他“出卖教会的利益”，我还多次背后說李付主教的坏話。

岳樹德神父土改回来后，我想尽办法要把他从西开調走。这个阴

謀虽未达到，我就在教友中散布他“不听命”。另外每逢若瑟主保占礼，我总不叫岳神父作大弥撒。天津沒人，我甚至写信叫远在鹹水沽的王化民来，也不叫岳神父作。平常的时候，我总跟岳神父作对台弥撒，为讓教友望我的，給他晾台。

为打击張濟众付主教，我說小營門是政府的堂，那里光热闹，进堂的沒人。張付主教任大修院院长后，我誣蔑說他“給政府造就干部”。同时我打发我的心腹人进大修院作反动的监视工作。我在外揚言，張是付院长，修生有事找我，不找他。破坏院长的威信，使他无法工作。

宋乐山神父是北京教区的神父，給天津教区帮了許多忙，但因为他爱国，我就打击他。我曾对仁爱会修女造謠說宋神父是“政府派来的”，煽动修女不望他的弥撒。——因为馬文斌神父靠近爱国会，我就說他卑鄙无恥，我还說过“新神父不願來河樓，怕跟馬文斌学坏了”。

1952年王洗耳神父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我因此非常仇視他，对他打击的很厉害，迫害他在天津站不住脚。

其他，对藍路一、張其明、吳景溪、王思賢神父等，我都設法打击。对于爱国教友的打击和迫害更是多不胜数了，甚至連死去的人我都打击。比如前爱国会主委吳克齋先生去世后，我造謠說他受天主罰死；我支持反动神父不給他作亡者弥撒。羅魯易神父要給作弥撒，我阻撓过。另外，我对爱国会干部更是恨之入骨，經常破坏他們的威信。

六、我破壞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及天津的傳達工作。

我出席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并且以兩面手法，在会上举手通过了會議的各项決議。回津后便陰謀推翻全國會議的決議，发起了瘋狂的进攻。我在去年（1957年）8月15日，在西开总堂里的近兩千教友面前发表了反动透頂的所謂“明補贖”，我說，我在北京大會的表現是立了“坏”表样，我們教友要“一切”服从教宗，并无恥地要求教友“寬免”、“原諒我在北京的行为”。这一来，不仅混乱了天津教区神长、教友的思想，并且波及許多別的地方。同时，在教区神长教友之間，制造流言蜚語，誣

蔑全國會議。另外我故意地混淆是非，散布了参加北京大会的代表都是神父主教們，有“宗教性”，应由教宗批准。这些造謠活動对全國會議所起的破坏作用极大。

由于我对全國會議的猖狂破坏，給天津的傳達工作以严重阻碍。当神父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不断提高觉悟，紛紛表示拥护北京大会決議的时候，我又拉他們的后脚。

七、我利用主教身分，支持了天津教區的反動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为了实现我个人的政治野心，我一貫利用主教职权，压制进步神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我积极支持了政治上极其反动的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我曾秘密委任反革命分子張本篤为地下付主教，并曾一度委張本篤、楊讓、劉品一、羅魯易为秘密諮詢員，組織非法的地下諮詢會，專門从事进行反抗政府政策、破坏反帝爱国运动、打击爱国神長教友的阴谋活動。另外，我委派反动分子楊讓以及羅魯易神父到天津神哲學院“坐探”，监视爱国神長；秘密控

制修生的思想，以“神师”的名义，用“訴心”的办法引修生們跟我走一条反动路線。同时，通过对修生的利誘、拉攏，使修院中的爱国神长不能行使合法职权，致使神哲学院一度反动气焰冲天。

由永年教区逃窜来津的反动分子任若石、潘国光，品質恶劣、政治反动，因与我臭味相投，我便收容并安排了他們的职务。經政府长期改造被寬大釋放的某些神父們，我一意进行拉攏、控制，使之跟我走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准备在津傳達的阶段中，由于我的煽惑，天津教区的反动分子紛紛蠢动，瘋狂向北京大会进攻，坚持罗馬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形成天津教区内頑強的反动集团。

通过这次社会主义学习，在大是大非面前，許多受我拉攏和欺騙的神长教友都觉悟了，認清了我的反动面目；过去与我一起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分子，在爱国神长教友的揭发、指責下，也都暴露了反动原形，因此，面对我的种种罪惡事实，我不得不認罰服輸，向人民投降。

× × ×

現在我对几个問題表明我的态

度，并提出保証：

首先，对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各项決議，我完全拥护、贊成，并且彻底貫彻执行。我保护决不翻改。

其次，表明我对爱国会的态度。过去我站在维护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上，对爱国会进行了瘋狂的攻击，甚致企图阴谋絕罰那些善良的、为爱国爱教事業而奔走的神长教友，企图搞垮爱国会，拔掉我的眼中釘，以便滿足我不可告人的野心。我不但在政治上犯了罪，也違背了作一个中国神職人員的准則，严重地違反了教規教義精神。今后，我保証坚决拥护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并坚决与爱国会通力合作；对于爱国神长，不但不再行打击，而且坚决依靠他們；对于教区事务，我要善为领导，并与爱国神长商量办理。

再次，关于与羅馬教廷的关系問題。羅馬教廷一貫仇苏、反共、敌对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以及和平民主运动的态度，是尽人皆知的。特別它对新中国一直未停止阴谋破坏活动：几年来，发出了許多反动政治命令，煽动中国神长教友反抗人民政府，作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复

辟的内应。作为一个有正义良心的中国人，对这种狂妄的政治阴谋不能熟视无睹，中国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亦不能例外，必须坚决反对。今后罗马教廷也仍不会甘心放弃对中国教会的反动控制。因此，提到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必须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上考虑。我们必须坚决与罗马教廷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割断一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联系。今后我保证领导着大家坚决不接受政治性的命令；它若因我们爱国而加以处罚和迫害的话，我们一概不接受。

至于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宗教关系，我同意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罗马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是由于罗马教廷惯于用宗教形式进行政治活动，往往又不能不破坏这种纯宗教的关系，因而我们对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的服从，也不能不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还有，关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问题。我认为，随着祖国的富强昌盛，中国天主教会也要站立起来，摆脱半殖民地状态。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尊严，中国神长教友要自己办理中国教会，争取中国教会的合法权益。中国一百多教区，正权主教很少，这就是罗马教廷基于政治原因企图威胁我们的一种阴谋。为了圣教会的利益，我们应该考虑自选主教的问题。各国都有教会，各国教会的主教都由各该国人充当。中国现在站起来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当然要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我们也要我们本国人当主教，如同其他各国一样。而且我们在政治立场上要支持自选、自圣主教。

最后，我表示，过去由于我反复无常，大家有些信不及我了。现在我坚决保证，以后绝不再犯各种罪过，大家揭发的也好，我自己坦白的也好，保证不再犯第二次；同时，请大家监督我今后的言行，如果再犯，请随时对我加以教育，我保证绝不食言。

更正 上期本刊（第6期）5頁左欄文13行“的國”應為“我國”，18行“極長”應為“神長”，6頁左欄第5行“羅教”應為“羅馬教”，10頁右欄第5行“九位”應為“幾位”，16頁左欄14行“憲天”應為“取天”，21頁左欄倒數第8行“放”應為“會放”，34頁右欄第10行及35頁左欄第2行“通謀”均應為“通謀”。特此更正。



(接上期)

根据圣教会的传说，耶稣的灵魂离开肉身之后，降到“灵薄圣所”去了。古教的圣人圣女们在那里等候默西亚——救世主降来，不知

几百年了，到而今忽然见到了救世主亲来安慰他们，并在不久的将来，即能偕同耶稣同登天国，他们该是怎样的欢喜喜悦呢！

194 耶 穌 复 活

瑪豆，貳捌，1—7；瑪爾谷，拾陸1—7；

路加，貳肆1，—12；若望，貳拾，1—18。

死后的第三天——巴斯卦的翌日（即今主日）的清晨，耶稣的灵魂在古圣人们拥簇之下，从“灵薄圣所”回到墓内。众古圣人一见到耶稣圣身受难的惨状，莫不感激流泪，伏地朝拜，并感谢耶稣救赎之恩。这时，耶稣用祂天主性的全能，使灵魂与肉身重新结合，立时复活起来。以前的伤痕，除去手足肋旁五处尚存留外，其余全都消失，完好如初。耶稣圣身获得了光明、神

速、神透、神健四大奇恩。当时耶稣身发大光，在众天神圣人们欢腾庆祝下，从紧闭的坟墓中光荣地复活出来。墓旁守卫的兵士们，都惊倒在地，不省人事，好久才甦醒过来。据吾人的推测，复活的耶稣的光耀美丽，比先前在大博尔山显圣容时，更光荣的多了。

上边我们曾说过，耶稣圣身的殮葬，因在巴斯卦的前夕，草率入殓，不够完备，圣妇们原预备了巴

斯卦安息日后，再来坟墓，給圣尸塗抹香料。巴斯卦翌日的清早，晨光熹微，加爾瓦略山景，还沉浸在



昏暗中。圣妇三人——瑪利亞瑪達肋納、圣母的妹妹瑪利亞、若望的母亲撒洛美，并不知道恶人们设兵守墓，并在墓门贴了封条。她们一路上忧愁地说，有谁能给她们揭开墓门大石，而进入墓穴呢？三人中瑪利亞瑪达肋納最年轻敏捷，她首先到了墓地，便遇見了惊天动地的奇事。据圣史瑪豆記載：“安息日一一巴斯卦既过，七日的头一天（即今主日），瑪利亞瑪达肋納同另一个叫瑪利亞的齐来墓地察看。忽然大地震盪，主的天神从天降下，把墓门石块掀开，并坐在上边。他一

天神的容貌如同闪电，衣裳如同白雪。守卫的兵士被吓倒昏迷在地，如死去一般。兵士甦醒后，急速跑回城内，把出现的事情报知了司祭长。司祭长马上召集长老恶人们会議，并用金錢买哄了兵士，叫他们說：在睡觉的时候，耶穌的尸首被徒弟盜走了。兵士們得了錢，就按恶人们嘱咐的话去作。这謠言在茹达省傳佈开了，一直到今日（瑪豆写聖經的日子）。”——据圣师們的解說，昏昧愚蠢的犹太人，用睡觉的人來作証；但是他們的証見竟然弄假成真，更有力地証明耶穌实在

复活了。

当兵士跑进城去的时候，圣妇們正抵达墓門，瑪达肋納第一个先赶到，她一見墓門大石轉倒一边，不覺大吃一惊，及至往墓內一望，只見墓穴空空：“誰把主的尸體給搬走了呢？”她傷痛極了，忙匆匆地跑回城內向伯多祿若望二位宗徒報告，說：“有人从坟墓里把主搬走了，也不知把祂放在那里了？”这时其他二位圣妇也來在墓地，同样看到墓門大开，內中一无所有，恐怖的气氛更籠罩了她们。突然兩個身穿光亮衣裳的人显示在面前，并給她们說：“不要怕！你们不是来找納匝肋的耶穌嗎？你们为什么要从死人中找活人呢？祂已复活，不在这里了！你们看安放祂——圣尸的地方！你们該當报給門徒們及伯多祿說：祂——复活了的耶穌要先你們到加里肋去，在那里，你們要看見祂。如同祂先前给你们說过：“人子必須要被交付于惡人之手，被釘十字架，第三日要复活。””圣史路加接着記述說：“她们——圣妇們从坟墓归来后，忙把一切的事，告知了十一位宗徒及一总別的人。給宗徒們报信的，有瑪利亞瑪达肋納、若翰納及雅各伯的母亲

瑪利亞，还有其他女伴。但是宗徒們对她们这些話，当作胡言亂語，不肯相信。”

对主耶穌最关心的二位弟子伯多祿和若望，听到这消息后，急不能待地向墓地跑去，一看究竟。据圣史若望記載說：“伯多祿同那个門徒——若望，就出去一齐跑向坟地，那个門徒——若望比伯多祿跑的快，先到墓所，向里面一瞻望，看見殓布放置一边，但沒有进入墓穴。西滿伯多祿随后也来到，进墓后，只見殓布在一边，耶穌蒙头的首帕另卷置一旁，并沒有同殓布在一起。这时节，先跑来的那个門徒——若望也进到墓內，一看情形，就相信了——圣妇們的話是真的。但是他們还不明白聖經上所載的：耶穌必該从死中复活。看完之后，他們一起又回到原处。”

這兩個門徒——伯多祿和若望觀察的結論：墓穴空了，耶穌的圣尸已不見了，但是看不出絲毫移尸的痕跡來。殓布头帕閒置兩旁，有力地說明，并未有过什么盜尸搶尸的暴行。惡人們在心慌意乱中捏造的謠言，不但起不了他們所期待的作用，反而成了耶穌复活的鉄証。

通十功 新亡者

龔	若	瑟	(46岁，四川吉松人)
曹	若	瑟	(58岁，河北威县人)
王	伯多	祿	(71岁，江苏青浦人)
錢	瑪利	亞	(55岁，河北撫寧人)
于	保	祿	(62岁，河南安阳人)
陳	伯多	祿	(59岁，浙江鄞县人)

周年

王	瑪	寶	賈	若	望
李	瑪	納	李	若	瑟
虞	大肋	亞	白	瑪	亞
丁	瑪利	達		利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捷克布日諾區斯威塔維城的聖母堂，建於13世紀。1781年毀於火災，又經重建起來。

(原載1957年12月號“捷克生活”)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